

# 薛暮桥的山东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 早期探索的贡献研究

陈新岗 张秀雯

**摘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典型案列。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奇迹,离不开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的英明领导和薛暮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苦奋斗。薛暮桥是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代表人物,他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经济实践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共同富裕,坚持公私兼顾,坚持国内外贸易相结合,尊重市场及各地差异。薛暮桥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重要内容,并对中国式现代化早期起步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薛暮桥; 山东革命根据地; 经济奇迹; 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贡献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4.05.015

薛暮桥(1904—2005)是从山东革命根据地走出去的著名经济学家。1943—1947年他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成为其经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起点<sup>①</sup>。薛暮桥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张卓元曾说:“经济学家进入中南海,这是当时人们对我国经济学界的赞誉。而率领经济学家进入中南海的,正是暮桥同志。”<sup>②</sup>薛暮桥是中国经济学人的楷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者,其经济思想尤值得研究总结。关于薛暮桥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他本人有过总结<sup>③</sup>,当代学者也进行过相关研究<sup>④</sup>。已有关于薛暮桥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历史细节,使我们对薛暮桥的经济思想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但罕有学者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研究薛暮桥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的历史贡献。分析薛暮桥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有何贡献,并探讨这些历史贡献的现代价值将对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陈新岗,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济南 250100; chenxingang@sdu.edu.cn); 张秀雯,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014; 727253974@qq.com)。

① 薛暮桥的经济学理论建构主要体现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政治经济学》是其新民主主义经济早期的代表作品,主要内容是阐述五大社会形态的演进,适应了新四军干部培训要求。《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是其新民主主义经济后期的代表作品,主要内容是总结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经验,可以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实践的山东样本,适应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要求。《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是其对计划经济的深刻研究总结,主要内容是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的经济建设经验以及分析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适应了全国统一思想搞经济建设的形势要求。《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探索》是其对市场经济的积极拥抱,主要内容涉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广泛要求。

② 张卓元:《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成功探索——读〈薛暮桥回忆录〉》,《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

③ 薛暮桥曾在不同历史时期写过《怎样办合作社》(1948)、《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1984)、《薛暮桥学术精华录》(1988)、《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1992)、《薛暮桥回忆录》(1996)等。薛暮桥著作等身,我们不一一赘述。

④ 相关研究可参见杨劝进:《薛暮桥经济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吴凯泰:《薛暮桥一生经济工作和理论研究的重要贡献》,《管理世界》2006年第6期;叶世昌、张远:《薛暮桥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武盼盼:《薛暮桥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百年潮》2023年第1期。

## 一、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典型案例分析: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奇迹

山东作为始终走在前列的省份,经济总量一直位居全国前位,现正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山东篇章。现代山东经济发展脱胎于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山东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而这个前提则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坚持。“我们能坚持,我们也能胜利”<sup>①</sup>,这句话道出了山东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共同信仰。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进程。山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于1937年,结束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要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阶段,空间上包括山东大部 and 江苏、安徽、河南、河北部分地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虽然晚于陕甘宁、晋察冀等根据地,但通过积极实施土地政策、财税政策、商贸政策、货币政策后来居上,成为全国范围内经济最成功的根据地之一,从而实现了战争年代的经济奇迹。

(一)在土地政策方面,通过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根据地农民减轻了负担,土地产权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历史奋斗目标。从图1看,在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减租减息运动,胶东区的贫农负担不断降低,这是当时农民各个阶层负担减轻的一个缩影。在解放战争时期,通过激烈迅速的土改运动,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产权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从1946年全省情况看,约1000万农民获得了460万亩土地,“改变了农村中土地占有关系”<sup>②</sup>。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始于1940年,晚于晋察冀边区和陕甘宁边区,早于其他抗日根据地,为最终在全国实行土地改革、解决近代中国的土地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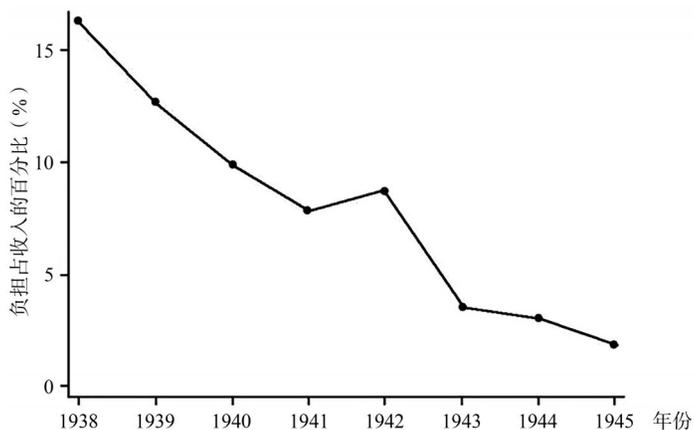


图1 胶东区1938—1945年贫农负担变化图

(资料来源: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第21页。)

(二)在财税政策方面,通过公粮征收与正税征收,根据地财经工作走向规范化,救国公粮征收数量不断增加。抗战初期,山东革命根据地通过征收救国公粮等方法,逐步建立了合理的抗日部队给养制度。救国公粮征收以合理负担为原则,“为了抗战,实行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向富有者征收钱粮,

① 罗荣桓、黎玉:《我们能坚持,我们也能胜利》,《大众日报》1943年7月23日,载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九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0页。

② 王启云:《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土地改革》,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以适用于游击环境<sup>①</sup>。1938年8月,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具体阐述了救国公粮实行统一累进税的基本原则。193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山东工作方针》要求:“已得的政权决不应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县区政府。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已得的财源决不应放弃,公开说明八路军及游击队打仗不能不吃饭。”<sup>②</sup>在战时敌后游击环境中,只能用合理负担财政动员的办法解决战争急需的军政供应问题。1940年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后,根据地政府相继公布了《山东省税收暂行条例》及其他一些税收法令,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工作逐渐走向正轨。以公平负担为原则的正税征收(主要是田赋、所得税等)逐渐成为主流,合理负担成为辅助办法。但即便如此,根据地救国公粮征收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从1941年的13644万斤上升到1945年的55924万斤,并有力支撑了抗日战争(见图2)。抗战胜利之后,山东省粮食总局领导征粮工作,救国公粮改为公粮,1949年公粮田赋改为农业税,公粮征收实现了制度化、规模化,并成为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游击环境下的公粮征收,还是省级政权成立后的正税征收,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平均负担水平远低于其他根据地<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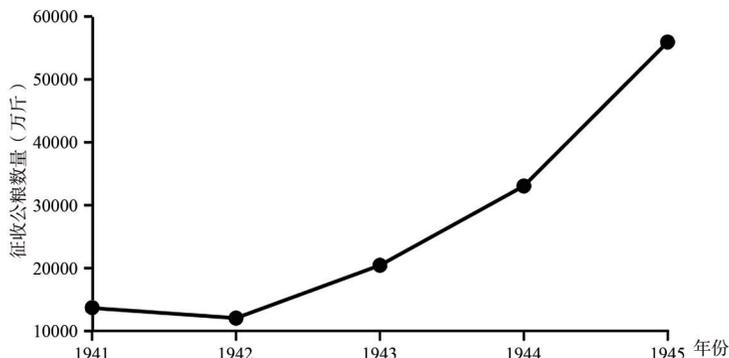


图2 1941—1945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征收公粮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第35页。)

(三)在商贸政策方面,通过统制贸易和自由贸易,根据地政府不仅掌握了重要物资,还打破了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封锁。在抗日战争初期,日伪政权经常用伪币、法币等套取山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战略物资。为此,根据地政府对外统制贸易,限制花生米、花生油、食盐、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出口。艾楚南说:“正确的贸易政策,就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严格的集权的统制,保障外来必需品的输入与内地剩余品的输出;同时禁止外来非必需品的输入与内地必需品的输出,并借此杜绝法币现金的流出与伪币假钞的混入,还可以利用伪币来换得必需品。”<sup>④</sup>与此同时,根据地政府在根据地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并进一步扩大到相邻根据地。为了打破敌人陆上封锁,根据地政府还积极寻求海外贸易,比如通过上海等城市进口枪支、药品等重要战略物资。谷牧曾说:“山东的经济工作搞得灵活,创造出许多其他根据地没有的经验,比如发展‘海外贸易’就是其中一项。”<sup>⑤</sup>1949年

① 艾楚南:《战时财政经济政策》,1940年8月,载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一辑),济南:济南印刷八厂,1985年,第19页。

②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四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0页。

③ 在财政总收入中,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公粮收入占总收入近一半,工商收入和税收之和占总收入近一半,而华北其他根据地公粮收入约占总收入的75%—80%。相应地,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农民负担水平较低,而其他根据地的农民负担水平较高。参见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第194页。

④ 艾楚南:《战时财政经济政策》,1940年8月,载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一辑),第16、17页。

⑤ 《谷牧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上半年,山东解放区海关进出口货值达到人民币1251.97千万元(见表1),海外贸易为革命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表1 1949年上半年山东解放区海关贸易统计(千万元人民币)

口岸	出口货值			入口货值			共计
	出口	转出	合计	入口	转入	合计	
石岛关区	103.76	133.22	236.98	128.60	186.64	315.24	552.22
胶州关区	100.91	17.29	118.20	108.30	18.42	126.72	244.92
烟台关区	96.66	69.58	166.24	132.70	89.75	222.45	388.69
连云港关区	3.99	51.12	55.11	3.94	7.10	11.03	66.14
合计	305.32	271.21	576.53	373.54	301.91	675.44	1251.97
百分比	52.97%	47.03%	100%	55.30%	44.70%	100%	

注:1955年实行币值改革,1万元旧币折合为1元新币。

资料来源: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第62页。

(四)在货币政策方面,通过北海币发行与货币斗争,根据地政府不仅取得货币主权,还有力支撑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北海银行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旗帜,其发展与山东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具有非常强的内生性。北海银行通过钞票发行、货币斗争、农业放款等方式有力支撑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同时,随着根据地范围扩大,以及货币斗争的相继胜利,北海银行成为根据地的主导银行,北海币从辅币变为主币,最大面值从1元变为200元(见图3)。北海币相继取得对法币、伪钞的压倒性优势(见表2),根据地物价日趋稳定(见表3)。对于货币斗争的全面胜利,薛暮桥曾撰文称,“东西贱了,日子更好过了,最近山东各根据地都产生了为多年未有的好现象”<sup>①</sup>。解放战争后期,北海银行对解放战争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同时,北海币与华中币、冀南币等其他根据地货币的互动日益密切,北海银行最终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为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成立)的奠基银行。

表2 1944年1月—1945年1月山东革命根据地伪钞的比值跌落情形

	1944年1月	1944年6月	1944年12月	1945年1月
滨海	1.50	1.10	0.16	0.15
鲁中	2.00	1.00	0.20	0.15
鲁南	8.00	1.00	0.20	0.15
胶东	0.85	0.80	0.25	
渤海	3.00	1.70	0.25	

资料来源: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6页。

表3 1944年1月—1945年1月山东革命根据地物价指数

	1944年1月	1944年6月	1944年12月	1945年1月
滨海	100	110	83	98
鲁中	100	87	73	69
鲁南	100	116	82	75
胶东	100	152	193	
渤海	100	79	56	69

资料来源: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226页。

① 薛暮桥:《山东的北海票》,《大众日报》1944年7月1日,载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二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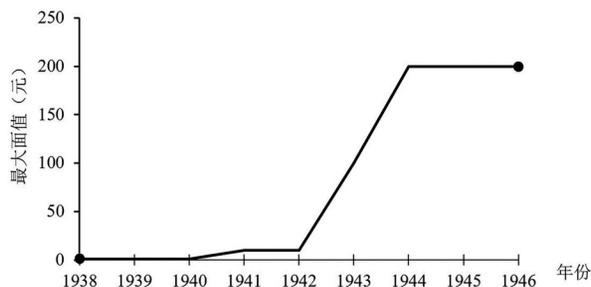


图3 1938—1946年北海币的最大面值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山东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四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66页。)

##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薛暮桥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

山东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包括薛暮桥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sup>①</sup>。薛暮桥早在1979年就提出,“在10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世界上还没有过”,因此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sup>②</sup>。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奇迹是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重要内容,它离不开薛暮桥的直接领导与思想贡献。薛暮桥从1943年初到达山东革命根据地,到1947年7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其间领导山东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这段时间是薛暮桥人生的重要转折时期——从理论研究走向经济实践。薛暮桥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代表人物。薛暮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主要体现为以下六点:

(一)中国式现代化应体现时空演化,尊重市场及各地差异。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两个重要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历史内容,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在抗战初期,山东革命根据地主要实行“减租减息增资”政策,以适应联合抗战要求<sup>③</sup>。薛暮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地区的差异非常巨大。所以中共中央所规定的土地政策,决不能机械地在各地一样执行;应当仔细研究各地区的具体情形,按照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来规定执行土地政策的具体办法”<sup>④</sup>。关于减租,他主张山东革命根据地应实行“二五减租”(按抗战前原租额减少25%),而不是机械地规定最高地租不得超过作物收成的37.5%政策。薛暮桥指出,之所以灵活地实行“二五减租”,主要是因为中国各地所流行的租佃制度异常复杂,“三七五”的规定不能普遍适用<sup>⑤</sup>。关于减息,薛暮桥认为根据地政府无法严厉禁止违法的高利贷,只能发动债务人自己起来要求减息。而最根本的办法,还是从积极方面增加银行低利贷款,并广泛组织合作社来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

① 薛暮桥经常到临沂山东大学(1945—1948年)讲课,主要讲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问题。1948年,临沂山东大学与华中建设大学合并,组建华东大学(成立于潍坊,后迁往济南)。1951年,华东大学迁至青岛与国立山东大学合并,成立新山东大学(1958年迁往济南)。鉴于薛暮桥与山东大学的渊源关系,山东大学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命名为“薛暮桥班”。此外,孙冶方(曾任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专科学校管理委员会主任)、顾准(曾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匡亚明(曾任《大众日报》社长)等著名学者也活跃在山东革命根据地。

②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6、191页。

③ 为此,山东革命根据地制定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1940年11月11日)、《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1942年5月15日)、《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1942年5月15日)、《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1942年5月15日)等办法条例,详见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六、八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9、291、295页。

④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66页。

⑤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83页。

(可能时应兼营信用贷款业务),这样才能使高利贷的剥削真正消灭<sup>①</sup>。关于改善雇工待遇,薛暮桥认为山东各地雇工工资已经很高了,因而反对机械地普遍增资,“根据各地调查,这样高的工资,雇主方面已经不易维持,近两年来解雇现象已很严重”<sup>②</sup>。从经济理论上讲,片面提高最低工资将导致失业。为此,薛暮桥主张采用“劳资两利分红方法”增加生产。最终,山东革命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收效显著,地主富农的地权及其他财富逐渐向贫雇农转移,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抬头翻身,进一步扫除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障碍。

(二)中国式现代化应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以改善民生为己任,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抗日战争时期,征粮是当时根据地政府的头等大事,但如何征粮却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1943年之前,山东的征粮办法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税率累进最高达到实产量的35%。但这种征粮办法“因征收率随产量之提高而提高,愿[致]使许多农家不愿增肥增产,影响生产”<sup>③</sup>。薛暮桥计算了一下,如果一亩地的实产量从100斤增加到200斤,税率提高了,每亩会多交几十斤公粮。边际产量小于边际成本,增产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极低。如果把实产量征收改为按应产量征收,能够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薛暮桥的建议很快被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所采纳。“以收入多少为标准时,应按各级土地的平均产量来计算收入。勤劳多产者不增,懒惰少产者不减,藉以奖励农民增加生产”<sup>④</sup>;“不按各块土地实际产量,而按同级土地平均产量作为计算收入标准”<sup>⑤</sup>。新的征粮办法一宣布,农民就忙着送粪锄草,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公粮收入逐年大幅增长。薛暮桥主张按应产量征收,保障了农民利益,获得了战争的物质支持。“按应产量征粮”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精神实质上可视为后者之滥觞,但比后者早了将近40年。

(三)中国式现代化应坚持国内外贸易相结合,灵活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从近现代主要大国的现代化历程看,国内市场是根本,国际市场是助力,贸易政策的目的是强化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山东革命根据地早期的贸易政策是“以货易货”,即一切输出物资要用商品交换,不能用法币结算。货币斗争胜利后,北海币成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主位币。相应地,在使用北海币结算的基础上,山东革命根据地的贸易政策需要作出调整。薛暮桥主持山东省工商局工作后,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政策变得更为积极主动,对外贸易取消以货易货政策,实行贸易统制政策,掌握重要物资,吸收外汇,换回根据地所需要的各种物资。贸易统制主要有三种方式:由公营商店专买专卖、限制输出输入、用提高或降低税率的办法来调节输出输入的数量<sup>⑥</sup>。关于这一时期贸易管理的主要收获,他后来在1947年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曾总结为三种收获:扶助并发展了群众生产,增加了公、私收入,完成了采购任务<sup>⑦</sup>。同时在根据地内部,薛暮桥主张实行自由贸易,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节。“在总供给增加而市场需求不足时(秋冬季节),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市场需求过旺而供给不足时,采取收缩性货币政策,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

①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94页。

②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97页。

③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指示》,1943年5月10日,载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九辑),第470页。

④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一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7、298页。

⑤ 薛暮桥:《山东各根据地现行征粮办法检讨》,载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一辑),第301页。

⑥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166页。

⑦ 在三种收获中,增加公、私收入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薛暮桥说,在食盐未管理前,在盐滩上盐民晒一百斤盐的收入,能换到三到五斤高粱;管理后盐民晒一百斤盐的收入,能换到十五至二十斤高粱,提高了四五倍。在食盐运输中,群众收入亦如此。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同样扩大了。当时滨海区的食盐收入,约占该区全部工商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工商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详见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5、6页。

的平衡。”<sup>①</sup>薛暮桥主导下实施的灵活贸易政策,渐渐使得山东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最富裕的根据地之一。

(四)中国式现代化应坚持独立自主,通过货币斗争取得货币主权。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不同于欧美现代化的路径,它的立足点是独立自主,过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薛暮桥认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必须以建立健全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为基础。薛暮桥领导的货币斗争,实现了货币主权,保存了战略物资,体现了独立自主精神。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货币斗争始于1942年夏秋之后,只在胶东区获得初步胜利。在薛暮桥领导的第二次货币斗争(1943年下半年—1944年上半年)中,北海币驱逐了法币和伪币,实现了“良币驱逐劣币”,最终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北海币市场。薛暮桥在货币斗争及其他各项斗争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他后来在1947年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曾总结第二次货币斗争,“伪钞自一九四三年秋后,亦开始猛跌,其速度且超过法币。因之我们必须脱离法币、伪钞,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sup>②</sup>。通过货币斗争,山东革命根据地“物价相当稳定了”,“(北海币与)法币伪钞的比价也降落了”,“争夺物资也是相当成功”<sup>③</sup>。当时,有一个美国新闻记者来山东解放区采访薛暮桥。他问道,北海币没有法定含金量,没有黄金白银贮备,也不与美元或英镑挂钩,但为什么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并认为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奇迹。薛暮桥告诉他,山东革命根据地采取“物资本位”。根据地政府控制北海币发行数量,勿使其超过市场流通需要。每发行一万元北海币,至少有五千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根据地政府会通过北海币的反向操作保持物价稳定,因而根据地人民更喜欢北海币,而不是黄金或者美元、英镑<sup>④</sup>。

(五)中国式现代化应坚持“三农”为本,通过合作社实现共同富裕。解决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薛暮桥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民问题还是首要问题,农业必须放在首位。”<sup>⑤</sup>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奠定了山东合作事业的基础。1943年薛暮桥来到山东革命根据地后,山东的合作事业有了较快较好的发展。他认为合作社的组织原则是“民办公助”,它是为群众服务的经济组织,是从个体经济发展到集体经济的桥梁,资金所有者与生产劳动者均有分红权利。薛暮桥主张由政府动员号召,通过合作社来组织发展群众的纺织生产。同时由合作社与工商局负责保证群众纺织生产的原料供给与成品推销,并且保证纺工织工的应得劳动报酬。合作社一定要有经济利益的保证,保持棉价、线价、布价间的一定比例,而不是单纯依靠政治动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革命根据地已有纺车一百万辆,织机十六万架,所产土布大体上已可自给自足<sup>⑥</sup>。1947年纺车增加到二百五十万辆,纺织生产已能全部自给<sup>⑦</sup>。此外,山东革命根据地合作社种类齐全,生产合作社包括纺织合作社、渔民合作社等,运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医药合作社也有所发展。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合作社运动,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帮助农民发展了生产、解决了困难,也使民主政府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更为新中国成立后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

(六)中国式现代化应坚持公私兼顾,公私合作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特征。笔者多年前曾提出“刘晏模式”<sup>⑧</sup>,主张在重大工商业经营中,国营企业不应与私营企业争利。在1943年秋工商管理总局未成立前,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公营工厂发展缓慢;自工商管理总局成立后,公营工厂得

①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②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2页。

③ 在三种收获中,争夺物资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薛暮桥说,在货币斗争胜利以前,每年有几万万法币伪钞流入我根据地,我们的宝贵资源亦即大批外流。货币斗争胜利后,我把几十万法币伪钞排挤到敌占区去了,换回了大批的物资,这使我根据地的财富大大增加了。详见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3页。

④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175页。

⑤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190页。

⑥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7页。

⑦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153页。

⑧ 陈新岗:《“刘晏模式”与中国历史上的工商经营》,《齐鲁学刊》2005年第1期。

到了快速发展。薛暮桥认为国营工厂应在群众生产中起带头作用,而不是与群众生产进行竞争。国营工厂欢迎私人资本参加,一部分国营工矿可以变为公私合营,或者发展为合作工厂<sup>①</sup>。在对内贸易自由问题上,薛暮桥认为国营商店与普通商店不同,它的中心任务是对敌经济斗争,不能把它降为普通商店的地位。他主张公私兼顾,国营商店不能与民争利,反对国营商店垄断一切有利事业,妨碍人民营业和盈利的自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并不反对私营经济,而是国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的共同发展。”<sup>②</sup>薛暮桥还主张必要时限制国营经济发展,以免妨碍私营经济发展。“目前为着扶助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各种生产事业,我们准备把我们的国营企业(包括工厂和矿产)转变而为私营或公私合营的企业,欢迎私人投资。国营商店更应整理收缩,予以必要限制,不容与民争利。”<sup>③</sup>1946年秋,面对抗战胜利的新形势,薛暮桥曾在《现阶段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提出三大生产建设方针,其中之一即主张当时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应以小规模的群众生产为主,而不是以大规模的国营企业为主。“今天我们应用十分之九的力量来扶助群众生产,发展小农业和小手工业,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另以十分之一的力量来建设国营企业,扶助资本主义私营企业。”<sup>④</sup>在土产运销方面,薛暮桥主张公私结合,政府贸易机关必须扶助私营企业(包括小商人和小贩),并且通过合作社组织广大群众,最终完成物资调剂供求。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公私合作政策,不仅发展了国营经济,还繁荣了个体商业,保护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三、薛暮桥的山东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主要贡献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式现代化就成为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迄今已有100余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山东革命根据地,连同在这里战斗的薛暮桥等人,进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杨欢进将薛暮桥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概括为:“稳定发展,巩固农业,注意就业,两个并举,引进创新。”<sup>⑤</sup>1946年5月18日,薛暮桥曾在《大众日报》发表《和平建设中的经济政策》一文,指出四种经济变化一定会到来:第一种是从分割封锁到全国经济的统一、市场的统一;第二种是机器生产的发展和与此联系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三种是私营经济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第四种是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美国经济势力之向中国伸张。但他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上述四种变化不会一蹴而就,“我们必须继续组织广大群众,在现有的条件下普遍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在这基础之上逐渐向着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方向前进”<sup>⑥</sup>。从山东革命根据地开始,薛暮桥就曾开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探索,直至改革开放前后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主张。薛暮桥的山东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具有出色的经济领导能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山东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奇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领导能力。薛暮桥等领导干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掌握并提高了经济领导能力。比如,在减租减息运动中,通过实地调研,山东革命根据地最终采取了“二五减租”方式。又如,北海银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弱变强,一步步助力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最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奠基银行之一。薛暮桥认为,“货币斗争比较武装斗争更加复杂,把握时机对于货币斗争同样有着头

①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262、263页。

②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253页。

③ 薛暮桥:《和平建设中的经济政策》,《大众日报》1946年5月18日,载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三辑),济南:济南印刷八厂,1985年,第37、38页。

④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302页。

⑤ 杨欢进:《薛暮桥经济思想研究》,第88页。

⑥ 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三辑),第39页。

等重要意义。这样的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组织和领导,是一定不可能获得胜利的”<sup>①</sup>。在革命战争年代,山东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们通过干中学,逐步提升经济斗争能力,领导山东革命根据地一步步走向成功。山东革命根据地不仅培养了诸如谷牧、薛暮桥、孙冶方、顾准等党内经济专家,更是多次派出党员干部“北上”或“南下”,领导了东北、南方很多省份的经济重建工作<sup>②</sup>。

(二)山东革命根据地始终坚持民生为大,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底线要求。中国共产党因始终致力于民生改善而获得百姓的支持与爱戴。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租减息、土地革命、田赋公粮征收、贸易斗争、货币斗争等,无一不是依靠群众的力量才最终获得成功。薛暮桥认为滨海区的货币斗争,因为善于利用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而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其中,政治力量包括政府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政府颁布法令停用法币,严禁法币伪钞流通,实行重要物资的输入输出的统制,严禁违法走私。群众团体动员群众排挤法币,协助政府查禁黑市,缉拿走私,拥护政府颁布的一切经济法令。”<sup>③</sup>根据地政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支持,取得货币斗争的最终胜利。通过群众路线,山东革命根据地最终实现了民生需求与政权需求的统一。黎玉曾撰写《大反攻前夜的经济工作(草案)》一文,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属于人民的战争经济,是战争胜利与民生需求的结合。“如果战争中不发展经济,不照顾民生,必将演成人民暴动反对正义的战争,使战争失败,政治失败。”<sup>④</sup>和平年代,在保证国家富强的前提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应是人民的共同富裕与幸福。

(三)山东革命根据地实现了经济奇迹,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革命战争年代,当时世界各国普遍实行金本位,但山东革命根据地既无金银储备,也不可能得到美元、英镑的支持,如何维持币值的稳定?薛暮桥深刻地认识到,在和平时期,金银是最贵重的物品;但在战时,关键物资(粮食、棉布等)才是最贵重的商品,由此开创了世界货币史上独树一帜的“物资本位”,并取得极大成功。正是因为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北海币成为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中流通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币值和信用最高的地方货币。薛暮桥认为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独立自主,保护人民财富,保证生产发展。“我们曾经一度把独立自主的思想模糊了。如在生产建设中认为手工业生产决不能与机器生产竞争。因而甘心依靠外货,放松了对我手工业的保护政策。”<sup>⑤</sup>为此,他主张通过保护关税政策、提倡土货、改进土货生产等方式,保护根据地的手工生产。薛暮桥还主导了山东解放区的合作社运动,解决了群众穿衣吃饭问题,实现了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有力配合了对敌经济斗争。

(四)薛暮桥的经济思想来自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薛暮桥领导山东革命根据地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各项实践,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可以说,薛暮桥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式现代化早期起步阶段的有益探索,对当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历史的、动态的和发展的。虽然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阶段,但薛暮桥在国有企业经营、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生产激励、货币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仍可为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指导。

①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山东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82页。

② 中共中央曾于1945年8月抽调部分山东干部去东北、10月派罗荣桓率9万余山东军区部队到达东北,继续从事解放斗争。后来,1948年、1949年又两次抽调山东干部随军南下,共计23000人左右,对南方诸省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③ 薛暮桥:《滨海区半年来的货币斗争》,载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一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6页。

④ 黎玉:《大反攻前夜的经济工作(草案)》,1945年7月17日,载于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五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1页。

⑤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132页。

## A Stud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Xue Muqiao's Shandong Practice to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en Xingang<sup>1</sup> Zhang Xiuluan<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P.R.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1921,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been an unremitting pursuit of the Party members for over a century. The Shando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1937-1949) served as a typical case of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Xue Muqiao's Shandong practice (1943-1947)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is early exploration.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Shando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experienced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 Xue Muqiao and his comrades who fought here conducted early exploration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Shando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actively implemented land policies, fiscal policies, commercial policies, and monetary policies,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economically successful base areas in the country and achieving an economic miracle.

Xue Muqiao has been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in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e engaged in economic leadership work in the Shando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from 1943 to 1947. Xue Muqiao's early explor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Firs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spects the market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reflecting the evolution of time and space. Second, it should always be people-centered, gaining widespread support from the masses. Third, it insists on the combin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 Fourth, it adheres to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Fifth, it focuses on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ddressing their issues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Sixth, it maintains a balance between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economic miracle" of the Shando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which Xue Muqiao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hese contributions includ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xcellent economic leadership capabilities, the mass line becoming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becoming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and the need for continuou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Starting from the Shando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Xue Muqiao began to practic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formally proposed the concept around the tim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a native economist, Xue Muqiao's economic thoughts have three major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the commitment to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a stro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o this day, his practical exploration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 management,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centive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can still provide valuable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words:** Xue Muqiao; Shando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Economic miracl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王玲强]